

· 国际问题探索 ·

# 全球与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兼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研究全球与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认为权力转移有两种模式:自然替代型与扩张替代型。本文也指出权力的三重内涵:自然禀赋、整体产出以及制度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阶层,美国的这些权力要素尚未被次级力量所全面超出,中、日、俄、印、欧尚无力形成全球权力转移。在区域阶层,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出现权力转移,德国和中国正在欧、亚取得地区主导权,尽管它们尚无可能根本改变全球的权力结构。

**[关键词]** 权力 权力转移 全球阶层 区域阶层

## 一、权力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乃亘古不变之现象。作为现实主义的解读,权力和权力转移始终是分析国际关系的核心变量。要研究权力转移,首先必须考察权力。无论是在氏族还是国家或是家庭,都客观地存在着权势以及权势拥有者。权势者权力之取得,或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而自然取得,或通过继承获取或权力阴谋而篡取,或经自然竞争而被承认。

只要权力存在,就必然有权力的转移,这是伴随着权势者或者权势国家之间相对竞争力发生变化所必然出现的。在国家内部,权势的转移在封建时代主要通过家族承继;在民主共和时代,则主要通过主流民意的及时与充分的表达,来达致权势的和平转移。而在跨国家层面,权势的转移也有不同形式,与此相随的则是权势国家的权力替换,或者新老强权的兴衰更替。国际权势兴替为世界历史所不断记录,其规律更为国际关系学界所持续研究。

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国际社会的竞争有诸多类似之处。在人类关系中,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为了在同类中出类拔萃,人类总在不断进行竞争,最终形成优胜劣汰。这也是自然界的生存与竞争法则。在竞争中胜出者,自然取得服众地位,也就能将其道德以及能力的领先地位转化为领导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为了本国安全和发展的利益,随时可能进行竞争与合作甚至对抗。这种国际竞争也同样导致优胜劣汰。健康有序的竞争可能促进国家的发达,而消极失序的竞争则可能恶化国家间关系,使得国际关系劣质化,危害人类社会。

## 二、权力转移的两种模式

综观民族国家成百上千年历史,不难发现国际间权力转移无非有两大类模式。其一,是自然替代型。在这一类型中,国家之间天然的竞争未必导致恶性关系,一国自然崛起虽然具有削弱既有大国主

**[收稿日期]** 2009-05-23

**[作者简介]** 沈丁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是复旦大学课题“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的研究成果。

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许嘉著:《权力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

导地位的倾向,但其势力上升仍处于可接受范围,因此伴随这种崛起的大致是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关系。这一类型的典范,包括美国海权取代英国海权。美国权力的崛起有诸多原因,包括其地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自然禀赋,但也有制度与技术革新以及国际时局变迁的因素。因此,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有其自然性,而且对英国不无益处,这种竞争乃英国所能接受,其结局相对平和。

其二,是扩张替代型。经常出现的权势转移,却是一国或国家集团有意识地扩充实力,并在地区或全球层面对外扩张,通过以损害他国正当利益的方式,而延伸自己的影响力或控制力。这种以强力挤压的方式削弱他方权益的行为,必然引起既有权势的不满,也更多伴随着国际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并引起国家与国家集团间的冲突。上世纪德意志与日本帝国的一度兴起,依靠的就是对外扩张的方式,它们曾在短期内分别主导了欧洲地区和东亚地区的局势,虽强盛一时,却不能持久。当轴心国成员联合谋取全球权势时,必然过分触犯全球范围内其他多数国家的利益,为盟国集团所不容,最终导致落败。

当代世界的唯一超级强权美国立国仅 233 年,但已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取得了人类罕见的强盛奇迹。美国在门罗总统期间就定位拉美为其“后院”,视南美这一近邻为美国的特殊利益地区。为了确保自身的国土安全和周边稳定,美国不能容忍该地区出现有损美国利益的“暴政”与“劣政”统治。美国的对外视线看得更远,还得追溯到一个世纪前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这位具有大学校长智慧美国总统在任内将国家送上了远眺两洋的世界主义之路,有力地拓展了美国的国际胸怀,美国的综合国力包括海军战力也在 19 世纪末攀至世界前列。但真正刺激美国迈向世界强权道路的,还是七十年前德日在欧洲和亚太的大举扩张。德日的对外侵略,不仅封堵了美国的海外殖民之路,损害了美国的贸易立国利益,而且直接将战火引向美国,从而迫使美国做出了战略反击这一最终通往世界超级强权的历史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历史,以及苏联在同美国争霸接近半个世纪后的和平解体,给予人类社会诸多启示。一方面,人们需要考察什么是权力的量度,苏联和美国当时究竟有哪些权力,以及这些权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研究当今美国之权力还能维持多久,其权力基础还需什么革新。从理论上考虑,任何权势都无法永恒。美国霸权不会无缘无故诞生,但也不会无缘无故消亡。那么,新起的权势又将是什么,它又将以何种能力在全球层面与美国竞争?如果无力在全球层面竞争,那么在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又会出现什么特点?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 三、权力的内涵:以美国为例

在传统意义上,国家的综合国力铸就了国家的国际权力。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国际权力,都体现在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整体产出和制度创新上。自然禀赋涵盖人口、幅员、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等等,整体产出则包括经济、军备与科技等领域。在经典意义上,工业化国家都可被认为是先进发达国家,“工业化八国集团”(G8)的主要参与条件也是国家的经济能力,突出表现为经济产出与经济竞争力。在常态情况下,一国的经济水平与其科技与军事竞争力成正相关。国家越富裕,就越有可能在防务与科技上予以投入。工业化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在经济、国防以及科学技术等领域不仅都相对突出并平衡,而且在整个世界的竞争中都曾长期领先。

但是,作为世界级的强权,美国对于“工业化八国集团”或其前身“七国集团”其他成员的相对优势又是巨大的。在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和第二经济体日本之间,美国的国家自然禀赋远远超出日本,其人口是日本的 2—3 倍(接近三倍),而且人口平均年龄较日本年轻。在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上,日本国内储备严重贫瘠,处于绝对弱势状态。日本严重缺乏矿物能源,油气等化石燃料

---

黄硕风著:《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6—13页。

必须大量从海外进口。而美国内陆与沿海均有相当程度的储油构造,可在世界能源危机时为美国提供不时之需。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日本更是望其项背。就整体比较,美国的经济规模约达日本三倍,相当于欧盟 27 个国家的产出总和。从军事投入而言,当今美国五千多亿美元的年度常规军费(不计每年反恐费用两千多亿美元)更是日本的 10 倍以上,几占世界军费总量一半。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之强大,已非人类历史上以前的历代强权所能比拟。尽管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在二战结束以来持续下降,甚至其经济产出因 2008 年金融危机而出现绝对下降,但迄今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稳固地把握着世界首要权势。

除了自然禀赋与整体产出之外,美国的强势还源于其创新能力,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的开国先贤在立国之初就体察人类弱点,设计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权力制衡,这无疑是美国两百多年来逐步兴盛的制度保障。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重振,到了美洲大陆则又体现出更多的人权保障意识与制度创建中的权力制约。考察过去两个世纪中美国与世界的发展,人们必须承认美国之强大的重要原因,明显包括其制度构建。这种设计中的基础即基督教的人性观并非为全人类普遍接受,但事实证明这至少在美国的国情下对分解国家权力、减除个人集权给社稷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

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之外,当代美国的软实力还部分来自基于其价值观的文化传播。美国的爱国精神、英雄主义、匡扶正义、家庭伦理等,在周末的教堂颂经、每日的早餐晨祷、每次的升旗典礼上不断得到弘扬。好莱坞的影像制作,则在商业规模上不断烘托美国精神与美国价值,使得美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范式不断渗入世界各地。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权力主导地位还很难根本动摇,国际社会还难以见诸替代美国权势的新兴强权。这是因为,要超越美国,或者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但竞争者要比它更有禀赋,更会创造,更具文化穿透力;或者能够创造新的模式,在同美国的和平竞赛中胜出一筹。这些不是没有可能,但在短期内还难成现实。但是,这也不意味着美国权力的基础没有发生松动,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身已经显著削弱了美国的金融超级权势地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已容忍其他经济体的相对崛起。而且由于美国在由主权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并不总是奉行在其国内被信为天条的民主原则,因此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领导力并不具备制度力量以确保其长盛不衰。从这些因素出发,考虑在未来十数年至数十年的中等时间段内以美国相对甚至绝对衰弱为特征的世界权势转移,并非不可思议。

#### 四、全球阶层权力转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权力转移是各权势者之间相对竞争力的竞赛问题。以当今美国作为参考系,权力转移或者发生在美国停滞不前,或相对进步不足,或其竞争者持续快速进步之时,三者至少得具备其中之一。那么,在当今世界,有哪些国家或国家联盟有可能同美国进行权力转换的竞争?就现有国家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来看,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只有中国、日本、欧盟、俄罗斯以及印度会有这种可能。下面比较研究这些国家或国家联盟同美国的相对竞争优势与发展前景。

##### 1. 印度

印度拥有灿烂的历史、广袤的国土和进入印度洋的便利条件,它还拥有十亿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力资源。印度社会所具有的英语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也只能被视作殖民阶段的正遗产。这些可能都是印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8: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9-183.

约瑟夫·乔飞著,蔡东杰译:《美国的帝国诱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07年,第44—54页。

近年来印度受到美国重视,其中有着美国考虑中国崛起的背景。2008年,美国与印度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已被双方议会批准,印度借此取得了与美国在民用甚至双用途高科技领域合作的机会。上届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印度的民主政治,认为印度是美国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印度在独立后经营自己的政治制度已有六十多年,虽然其民主政体不无优势,但其制度迄今未给广大的印度贫穷人民带来根本福利。在文化上,印度的民主没有解决由于宗教所带来的落后的种姓制度问题,许多印度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长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在经济上,印度尽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其中产水平本身有限,全民人均人文发展指数偏低,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滞后。从整体上看,虽然印度近十年经济发展较有起色,有望在数十年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前列,但仍难以成为未来世界的核心大国。

印度自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人们往往简单地在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目标之间划等号。民主的原则是多数人决定,这本身蕴涵着重大风险,那就是多数人也可能集体性地犯判断性错误。美国上世纪的 O. J. 辛普森案件可能就是一例。由于过分追求民主的形式,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符合了陪审团多数成员的价值观,但并未吻合多数美国民众的是非判断。又如布什政府在 2003 年决定对当时的伊拉克政府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实现对方“体制更换”。但美国师出无名,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国际支持上都缺乏道义与法律基础,但当时美国民众在经历了“9·11 恐怖袭击后仍相当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今天人们重新审视民主,也许应该铭记民主作为一种原则与方式,其根本目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由于民主而带来的进步和福利。显然,走向进步和福利的道路未必只有民主一种方式,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也带来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民主被普遍认作好东西,但民主也未必只有美式一种范式,而可能有各种范式。至少,印度式的民主迄今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充分发展和稳定,它难以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也难以支撑印度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 2 日本

日本明显缺乏成为世界首强的重要禀赋。首先,其地域狭小,并且缺乏战略纵深,不具备成为世界顶级强国的地理禀赋。日本在上世纪发动对珍珠港的袭击,至多只能取得战术性的效果,延误美国海军战略西进,而不可能在战略上逆转它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所处的战略劣势。作为海洋岛国型的国家,日本始终面临海洋给它带来的脆弱。在世界顶级战略空军的威慑之下,日本很难实施有效自卫。这种战略脆弱,使得日本不堪承受超级大国的重任,这种地理劣势是它无法改变的。

在全球阶层上,日本的人口因素也是牵制它实现超级大国地位的障碍。其实,日本人口数量不少,是世界上人口总量在 1 亿以上的少数国家之一。但是,日本迄今只有 1.3 亿人口。虽然本州已经“人满为患”,但同世界首号强国相比,人口数量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强,更是东亚邻国中国的一成,以及印度的七分之一。在同等人口素质条件下,无论是工业经济还是知识经济,日本不可能占优。在经济共赢时代,日本人力素质的竞争优势不可能长期领先。面临老龄化的趋势,即使日本开放海外劳动力市场,也无法从根本上逆转日本人力资源同中印相比的严重不足。

日本的自然资源更是匮乏。无论是化石燃料,还是其它金属矿物,这个岛国都十分匮乏。在军国期间,日本通过对外扩张来解决资源不足。在战后,日本则奉行和平主义,通过科教兴国和知识创新,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 3/4,在有限的自然禀

---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and Jing-dong Yuan,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3) 79-103.

Yu Keping,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in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3-5.

赋下达到了相当水准。 但就因日本人口数量有限,日本的经济体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再次表明日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争当世界第一。

日本的核心竞争要素是其科技创新与民族素质。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和对高新科技的研发,是使它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和平岁月中化腐朽为神奇的制度原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走过的革新道路,其他国家可以模仿;而中印所拥有的人力和地缘优势,日本却无法效仿,这是制约日本赶超美国并使日本难以摆脱被中印赶超的根本原因。

### 3. 俄罗斯

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与美国并驾齐驱,曾在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上长期与美国竞争,但最终败下阵来,这有着深刻原因。

前苏联的强大,一在于其意识形态。莫斯科奉行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原理是在世界上形成高度发达、消灭剥削的平等化大家庭,这对落后的农业国国民不可谓不具有吸引力。二在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一度快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前苏联综合国力有过迅速提升。但前苏联的失败教训也是深刻的,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根本上缺乏制度创新,没有将改善人民生活长期置于国家要务。前苏联执政党过分重视国际竞争,以至于国家建设的成果没有充分并及时地转化为能使人们感知的实际收益,从而引起前苏联当局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这样的国家同样不堪长期充当超级大国的角色。

当今俄国继承了前苏联的自然禀赋。虽然原先的诸加盟共和国已分崩离析,但仍给俄罗斯留下了世界各国中最为优质的资源:辽阔国土与自然资源。就数量与质量而言,俄罗斯的人力资源仍属世界上乘。这些优势确保了俄罗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望维持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

但要作为超级大国的竞争者,俄罗斯仍有重大缺陷:制度和人口。俄罗斯人口问题与日本相仿,同样处在萎缩过程中,当然这也反映出民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仍然不足。用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去建设将近两倍于美国的国土,俄罗斯力不从心。更严重的问题是其人口锐减的颓势尚未止住,这与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景象不符。

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也备受关注。美国一度受俄罗斯体制转型鼓舞,但很快发现俄罗斯甚至独联体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仍为前苏共党员,或许他们执行的是一条没有苏共的新集权路线,这难为西方所容。美国对普京领导俄罗斯的方式十分不适,对普京换任总理的俄罗斯政治耿耿于怀。但对俄罗斯而言,其再度崛起的难度不仅在于寻求西方的接受,更在于它还在寻找在俄式民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国家和地方、政府与民间之间关系的新的法律体系。在制度到位之前,俄罗斯不易入选未来超级大国的候选队伍。

### 4. 欧盟

毫无疑问,欧盟作为一支新的地区力量,已成不可忽视的权势。欧盟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它的整体经济实力已可媲美美国,当今欧盟 27个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已同美国相当,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单一力量所不具备的。另外,欧盟不是一个单一国家,而是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集合。所以,考察欧盟,不能期待欧盟的行为方式会同国家十分一致。

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还在发展,规模还在扩展。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了联盟内的政经和法律制度。此外,它还孕育着安全和防务政策——独立于北约防务以外,欧盟正在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快反部队和警察力量。 联盟继续推进集体防务,势必削弱成员国的国家防御和北约这个跨大西

---

CIA, "The World FactBook - Rank Order GDP-per capita, (PPP)" <http://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 (updated on July 24), accessed on August 31, 2008

金重远等编:《寻求秩序、安全与发展——俄罗斯转型中的挑战与对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82-84.

Shen Dingli, "Why China Sees the EU as a Counterweight to America," *Europe's World*, Autumn 2008, October 2008, pp. 48-53

洋安全共同体的存在理由。

因而,在理论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有望成为新世界的独立权力兴起,而这一权力的超众实力,具有有效制衡目前唯一超强的能力。然而,由于欧盟是一个国家联盟,尽管“老欧洲”与“新欧洲”国家的价值观不无可能经常达成一致,但联盟成员间不可能没有矛盾。按照一致共识的议事方式,欧盟可能陷入无法有效决策的困境。譬如,欧盟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制裁时,就只能议而不决。在对待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倒萨战争”时,“老欧洲”国家法国和德国按照国际法原则竭力反对,同新入盟的原北约国家严重分歧。一个经济超强但仍然缺乏完整独立防务的欧盟,在政治问题上仍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目前还难以在世界上承担独立的政治和外交中心的使命,它甚至担心是否被中国的独立作用所超越。

## 5. 中国

自1978年底中国大陆(以下为方便计,有时简称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来,中国的国力已取得了显著发展。中国进行改革,一为排除发展道路上的思想禁锢,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制度创新。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已成功进行了实验。如今,实事求是谋发展已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原则。

随着发展进步,中国的国力也成倍增长。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连年以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加上人民币的升值,以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平均接近2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以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计,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4万亿美元,超出德国。2008年达4.4万亿美元。我国有望在2009—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相应地,中国是否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也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一方面,中国朝野当然希望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这就引起世界关心的国际权力转移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低调回复各种疑问,坚定表示和平发展。中国认为:即使是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还需要至少一百年时间。

很显然,中国具有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诸多禀赋:中国的幅员、自然资源总量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美国相当。从人力资源的积极意义出发,中国13亿人口是中国潜在最大的财富。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以上,是美国和印度相加的总和。如果说人多地少是不利因素,那同日本比较一下,也许看法又会不同。我国人口数量是日本的10倍。中国的陆地国土是日本的38倍,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接近日本的4倍。换言之,即使在当今中国人口已经是日本10倍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有比日本优越得多的自然条件。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还有待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虽然人多未必是消极因素,但至少目前它还不是中国发展的十分积极的因素。和日本一样,中国重视教育。但当代中国与日本的区别,是中国大陆教育资源仍相对匮乏。美国3亿人拥有3000所高等院校,中国13亿人只拥有1000所高等学府。虽然中国高校平均招生人数高于美国,但仍然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人均教育资源的不足,必定牵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

李雁争:《2007年中国GDP增幅上调至13%,经济总量已超德国》,《上海证券报》2009年1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gncj/news/2009/01-15/1528554.shtml> (accessed on May 22, 2009).

任小燕:《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信息报》2009年5月19日,[http://news.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JL\\_20090519\\_00000754&columnid=1221](http://news.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JL_20090519_00000754&columnid=1221) (accessed on May 22, 2009).

郑必坚著:《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新道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

新华社2007年2月26日电。温家宝总理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

除了中国人口教育素质的竞争力欠缺以外,中国还存在人均资源不足、科技原创滞后、环保生态欠帐等诸多问题,妨碍着这个国家有效地走向世界最前列。我们发展所面临的下一个核心瓶颈,是深化制度建设和推进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随之必然提出生产关系的现代化需求。提速政治文明建设,落实可持续发展,必将促进国家的根本利益,增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从以上所分析的当今世界五个次级力量的力量要素,可以发现在自然禀赋和制度创新这两大国家权力的来源中,五方各有千秋。从地理、地缘、人口、资源、生物多样性这些核心的自然要素看,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均有所长,也各有不足。这些新兴力量国家普遍面临制度转型,在这期间遇到问题并不奇怪。制度建设也是美英等工业化国家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发展的,需要政治文化的同步提升。

在上述五方中,日本是自然禀赋相对较弱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迄今表现突出,那是由于其高度重视教育、官民并举科技所致。然而,日本的制度与文化优势,并非它可长期垄断。中国结束了十年内乱后,也就开始了求实创新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经济产出超过日本的一刻即将到来。随着未来我国制度建设和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中日人均产出的鸿沟必将缩小。中国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大量存在,对中国可能是重大负担;而中国高素质人群的大量培育,对日本则带来竞争压力。中日都有大量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中国处理得当,其潜力就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 五、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

如上所述,没有永恒不变的权力,而权力转移则在永恒进行着。但要取代今日超级大国,却绝非易事。美国的自然禀赋不会无故消失,唯有美国的制度设计或运作出现问题,或其他竞争国的制度创新出现重大突破,不然,无法展望近期出现全球阶层权力的完全转移。

但是,即使全球阶层的权力转移不即刻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国家竞争乃至权力转移却有可能较早出现。这种情形已经明显地发生在欧洲与亚洲。

在欧洲,在二战结束之后,英国一度是核心国家。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国作为盟国在欧洲的主要伙伴,承担了抗击德国扩张的重要任务并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法国由于在战争期间被德国占领,其重要性自然不如英国。至于德国,这个战争期间的敌对势力在战后则是美国与盟军清算的对象。战后德国被分而治之,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

然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联邦德国相对彻底地清算了其前身进行侵略战争与种族迫害的思想渊源,走上了和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西德还采取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发挥了本民族认真与创新的优秀,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并且它积极寻求与昔日对手的和解,从而有效地重获西欧与国际社会的接受。西德还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在两德统一后,逐步演化为欧盟政治经济的核心。这个没有核武器、在联合国安理会也没有否决权的国家,却在欧洲与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不亚于英法的重要作用。

在亚洲,始终存在着中国和日本的合作与竞争。在自今上溯千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在东亚起着主导作用,日本曾长期受惠于中国。但自19世纪末起的半个世纪中,在扩张战略主导下,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进行侵略,力图控制西太平洋地区,从而造成与这个地区诸国和人民的重大冲突,不仅严重伤害他国,也损害了本国的根本利益。在战后,中国依其在二战中的贡献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则被联合国视作敌国。然而在经济上,日本经和平重建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在中日恢复邦交关系后实施了对华援助。

中日两国在最近百年来的交往中,日本长期在经济和军事上处于强势。但此种格局,在中国大陆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之后,正在酝酿重大变化。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大陆的经济产出将超出日本,而中国军事投入也将同时达到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一倍。与印度相比,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规模已接近印度四倍,这种优势还在扩大之中。

因此,大约从 2010年起,中国将由于自身的迅速发展而在亚洲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综合主导地位。诚然,中、日、印三国在全球系统内尚不具备使世界权力发生根本改变的能力。但依据亚洲诸强实力对比的变化,这个地区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转移。中国有望赶超日本,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亚洲核心国家。中日战略对比的天平,将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大幅向中国倾斜。印度尽管也在快速进步,但它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还有待证明其绩效。新德里若不务实,有可能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年代中被中国进一步甩开。

笔者还要指出,美国和日本人口相差将近一倍,但双方人均产出相对接近(美国超出日本三分之一)。美日的经济成就,反映了这两个国家超乎群类的权力优势:禀赋加制度。中国的经济规模即使赶上了日本,在亚洲确立了主导权,但仍与美国有三倍之差,仍暂时无法撼动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所谓的中美两国集团(G2)来实现世界共管,尚不现实,而且中美的合作地位也不平等。在全球阶层,权力转移仍是个渐变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要再上台阶,必须保护好国家的自然生态,维护劳工的工作权益,这都迫切需要中国创制立新。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被取代的权力转移并非没有可能,但不在眼前,其实现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创造新制度,打造适合国家新兴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人们需要注意,即使中国实现赶超,中国也不见得能长期垄断。其他一些国家如印度的自然禀赋,也使得印度有可能在合适的新制度下对美、中形成竞争压力。

## 六、超越权力

本文研究的重点,乃是现有国际体系中是否并且如何出现权力转移的问题。根据现有各大国国力演变的线性推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现有国际体系仍将得以保持,在未来十年内目前的国际秩序尚难有可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还有可能继续维持其超强地位。虽然美国在 2008 年后遭遇金融风暴,在全球化背景下其他诸强也都受到波及,经济危机迄今并未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不过,对于二十年后的情形,现在尚无法准确预言。作为线性外推,美国经济发展虽将继续缓慢上升(或下降),但中国经济即使“保八”也能使它在二十年内再翻两番,从而在经济总量上超出美国。其实这还是简单的推测,线性推测对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可能不那么准确。二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与物价、货币汇率、民众的购买力、宏观经济结构以及科技竞争力都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就中国内需扩大的潜能来看,未来 13 亿或者更多的中国人的消费,可能对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都提供空前繁荣的机遇,届时中国大陆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确存在可能。而当经济产出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后,国家财富按一定比例投放在教育、科技、防务等建设领域,相应的总量都将在世界级,尽管人均投放一定还不如美国和日本。在那时,可说全球阶层的权力转移会出现相当的变化。

但即使在全球阶层尚未发生权力的根本转移,国际社会已经能够明显感知中国大陆后来居上的步伐,这会给列强带来双重后果。第一,新权势上升所产生的压力,无论是心理感受还是实力对比,不感觉到压力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国实力上升乃是在现行国际体制内实现。虽然中国崛起在事实上也影响了既得利益者的绝对权威,但北京仍然抓住了全球化的时机,通过与世界合作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并从中分享一部分。就此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以给各国各地区提供机会的和平方式进行的,这使既有权势无法以武力方式予以反对。

可以说,这种新兴力量的和平崛起,借助的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时机,这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历史上强权之间的竞争,诱因往往是对外扩张以谋取海外土地与资源,因此一国兴起经常伴随着既有大国利益的受损。但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法体系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全球



集体安全体制,对外殖民扩张已不再被接受,联合国可以采取集体武力的方式制止侵略。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使得人类更有可能不必通过掠夺他国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在当今世界,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科教产生的高附加值,一国可通过知识创新或者加工业制造,来获取大量新的财富。通过制造、创意与贸易,新兴强国的崛起模式已摆脱传统的扩张,而是采取温和的、在现有国际体制内的增长,循序渐进地崛起。过去的战败国日本、德国在战后的和平崛起,选择的都是这种模式。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美国在近年来与中国的交往中,已意识到虽然中国国力尚不致即刻改变国际秩序,但一味排斥中国并不能收到实效。布什政府尽管外交成绩不如人意,但他在任期内处理对华关系相对比较平稳。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曾于2005年发表演讲,呼吁中国成为国际系统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种政策也为奥巴马政府所继承。这标志着美国以分享权力为代价或利诱,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美国在新世纪初对其世界权力观的重大调整。

然而,只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就很难得出上升中大国获得权力的增量必能使现有国际体系诸成员同时感到满意的判断。新兴强国的兴起,势必影响现有强权对国际局势的主导。因此,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无法对权力竞争的后果必然感到乐观。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接受,并非由于自愿,而基本出于无奈,因为中国体量太大,无法遏制。一些国家过去在冷战年代对中国进行遏制,没有取得成功。那么,在中国谨慎地按照主要由美国等西方世界确定的国际关系规则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情况下,对中国围堵更缺乏现实可能性,因此列国也就只能接受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一客观现实。

如果希望未来世界能够和谐相处,国际社会还应提倡放弃零和竞争的传统思维,而采纳超越权力的更加先进的理念。德国崛起并在欧洲发挥核心作用,得益于欧盟的发展。在欧盟体系内,现有主权国家对权力都作了让渡,而给集体性的欧盟理事会与欧盟议会以相应的领导权。所以,在形式上德国并未取得额外的权力,而其他“老欧洲”国家也没有对德国放弃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只是人类探索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形式,使得一国权力的增大不以他国权力指向性的缩小为代价。将来在对待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全球权力可能转移的方式上,国际社会也需要发现能够共赢的新模式。

## Global and Regional Hierarchies in Power Transition : China ' s Peaceful Rise

SHEN Ding-li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power transfer.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have been two types of mode of power transfer - natural replacement or expansionist alteration. It has also defined three components of the power: natural endowment, overall output,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global level, America's power ingredients have not yet been surpassed by the next tier of power competitors. China, Japan, Russia, India and EU have not been ready to forge the shift of power globally. At regional level, such power shift has been in the making in Europe and Asia. Germany and China are ascending to the power center in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though they are still unable to alter the global power hieratical structure.

**Key word:** power; power transfer; global tier; regional tier

[责任编辑 刘 慧]

---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September 21, 2005.

潘忠岐著:《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4—257页。